

# 绪论 觉醒·蜕变·开放

## ——中国近代文学的宏观审视

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我们把这 80 年的文学称为中国近代文学。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又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sup>①</sup>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风雷、变革求新的时代。80 年的历史固然有中华民族耻辱的纪录，但更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人民的英雄气魄和探索真理的精神。作为时代艺术反映的中国近代文学，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多灾多难而又充满生机的这段历史进程。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读者看到了清王朝腐败颓废的面影，殖民主义者残暴贪婪的本性，以及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和艰苦探索的战斗风貌；在这些画面的背后读者也听到了中华民族的饮泣、呐喊和前进的脚步声。

这不平凡的 80 年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文学。作家视野的开阔，文学体裁的完备，人物形象的刷新，审美理想的变化，都有别于古代文学；而话剧的产生，翻译文学的繁盛，文学期刊的出现，文艺社团的兴起，以及“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此起彼伏，形成了近代文学繁荣兴盛、万紫千红的局面，开创了一代文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93 页、595 页。

学的新纪元，其成就是光辉的。

近代文学的容量和光彩，如何科学地评价，至今仍未有结论，主要原因是缺乏研究及由此而造成的偏见。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在艺术形式格局方面比较完备的文学。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的文学体裁在近代都产生了。像话剧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也在近代戏剧发展和革新的基础上通过外来因素的催化剂而诞生了，尽管它还未有硕果问世，在文学园地里总算又多了一个品种。他如翻译文学，报告文学，都是在近代产生的。

中国近代文学创作也是繁花似锦、绚丽多姿的。我们姑先不谈它是在中西文化撞击下所产生的具有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创作主题、新的审美规范、新的艺术表现、新的传播系统的一种开放型的文学（这点留在下面谈）；单就数量而言，就是一宗十分宝贵的财富。近代文学总的储藏量至今尚不清楚，但仅就粗略的估计数字看就相当惊人。

先说诗歌，中国近代诗有多少家？难有确数。徐世昌所辑《晚晴簃诗汇》收清代诗人 6 100 余家，属于近代诗人者倘以三分之一计，当是 2 000 家，今从严掌握，再以现有诗人折半计，近代也有诗人千家，诗作当以数十万首计<sup>③</sup>。关于词 叶恭绰《全清词钞》收清代词人 3 196 家，倘仍以三分之一计，近代词人也当在千家<sup>④</sup>。至于文，数量更大。《清史稿·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收清人文集 4 575 种 柯愈春辑《清集簿录》，著录清人文集将及 16 000 家，其中属于道光以后者又居大半，我们从中严加淘汰，与散文有关而又属近代者也当在千家以上。

关于小说 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中说：“晚清小说 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始终没有很精确的统计。书目上收的最多的，要算《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一共

阿英先生说：“译印西洋小说，现在所能考的最早期间，是在乾隆的时候，约当公历 1740 年左右，那时期都是根据《圣经》故事和西洋小说的内容，重新写作，算为自撰，如欧文《杂记》之类。”（《晚清小说史》第十四章）但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始于近代。至于古代翻译的佛经，虽其中不乏富有文学色彩的作品，但还不能称为“翻译文学”。

② 李远：《五十二年前的一篇报告文学》，《南方日报》1963 年 4 月 4 日。

见拙作《近代六十家诗选·前言》，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据先师黄孝纾教授在《清名家词·序》中云“为辑全清词钞，诸词学专家广为搜访，仅在庚辛（1930—1931）间所见词集”者，道光同光宣五朝就有 1062 家。现《全清词钞》收道光后词人 1 300 余家。

见黄征《近代诗文集的史料价值及其他》，《南京大学学报》1987 年第 3 期。

收翻译小说近四百种，创作约一百二十种，出版期最迟是宣统三年（1911年）。……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约三倍于涵芬楼所藏。查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收创作小说 462 种<sup>①</sup> 翻译小说 608 种，两者相加已超过千种。日本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 1997 年 10 月出版），收近代 1840—1919 创作小说 7 466 种，翻译小说 2 545 种，合计 10 011 种（含少量短篇小说）。这个数字比中国古代小说的总和还要多数倍。近代短篇小说，也数量惊人，据现存报刊杂志、专集的不完全统计约 6 800 篇<sup>②</sup>。

近代戏剧 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收传奇、杂剧、地方戏、话剧 161 种；但阿英所收仅限于 1901—1912 年即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的作品。赵晋辑《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报刊发表的戏曲剧作编年》，收 1896—1911 年间报刊发表剧目 169 种<sup>③</sup>。梁淑安、姚柯夫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简目》收剧作 234 种<sup>④</sup>。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收杂剧、传奇属近代部分者 542 种。

近代文学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也有自己光辉的、独特的成就。首先引人注目是近代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鲜明的时代特征、审美理想和争奇斗妍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已故著名学者兼诗人汪辟疆在《近代诗人述评》中云：“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使无近代诗家成就卓卓如此，诗坛之寥寂可知。”<sup>⑤</sup> 在近代诗坛上，继呼唤“风雷”、开创一代诗风的龚自珍（1792—1841）之后，受鸦片战争火与剑洗礼的一批诗人登上了近代诗坛，著名的诗坛老将张维屏（1780—1859），他第一个发出了反侵略的怒吼，写下了“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sup>⑥</sup> 的英雄史诗《三元里》和《三将军歌》，同时的魏源（1794—1857）、张际亮（1799—1843）、陆嵩（1791—1860）、朱琦（1803—1861）、姚燮（1805—

这个书目所收并不完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待出）所收小说书目中仅 1900—1919 年间就有五百余部

方正耀：《论中国近代短篇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 6 期。于润琦又说：“这时期的短篇小说不少于万余篇。”（见于润琦主编：《清末民初小说书系》各卷“代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年版）。

③ 《戏曲研究》第 6 辑，1982 年 7 月出版

《文献》第 6、第 7 辑。

⑤ 《南京大学学报》1962 年第 1 期，第 29 页

⑥ 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关于鸦片战争的文学》，《鸦片战争文学集》上册，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 页。

1864)、贝青乔(1810—1863)、金和(1818—1885)等诗人也都写了许多优秀诗篇,洋溢着昂扬的反侵略的爱国精神,风格沉郁悲愤。继之登上诗坛的黄遵宪(1848—1905)以他的“我手写我口 古岂能拘牵”的《杂感》揭开了“诗界革命”的序幕。接着夏曾佑(1863—1924)、谭嗣同(1865—1898)、梁启超(1873—1929)、康有为(1858—1927)、蒋智由(1866—1929)、丘逢甲(1864—1912)、丘炜菱(1874—1941)等以其“新派诗”照亮了近代诗国的天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人境庐诗草·自序》);“直开前古不到境 笔力纵横东西球”(丘逢甲:《说剑堂集题词为独立山人作》)开拓了近代诗的新视野、新意境、新天地,确立了新的审美规范。南社诗人柳亚子(1887—1958)、高旭(1877—1925)、陈去病(1874—1933)、马君武(1881—1940)、黄人(1869—1914)、黄节(1873—1935)、苏曼殊(1884—1918)、王德铤(1897—1927)他们“鼓吹新学思潮 标榜爱国主义”(《马君武诗稿·自序》)呼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近代杰出的女革命家、女诗人秋瑾(1877—1907),她的革命浪漫主义诗篇孕育着浓郁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雄丽悲壮,一唱三叹。此外,宋诗派的郑珍(1806—1864)、何绍基(1799—1873)、莫友芝(1811—1871)、江湜(1818—1866),同光体的陈三立(1852—1937)、沈曾植(1851—1922)、范当世(1854—1904)、沈瑜庆(1858—1918)、俞明震(1860—1918)、郑孝胥(1860—1938),学习汉魏六朝和盛唐的王闿运(1832—1916)、邓辅纶(1828—1893)中晚唐诗派的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58—1920),以及不名一派的李慈铭(1830—1894),各具风采,各有建树。近代诗这种多流派、多宗尚、多风格,织成了近代诗空绚丽的彩虹,总的成就“达到了唐宋、清初以来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在它发展后期矗起的又一座高峰。”

近代词,也有其光辉处。清词跨元越明,呈现复兴趋势。词学大师朱祖谋说:“清词独到之处 虽宋人也未必能及”<sup>②</sup>;而鸦片战争后的词“亦更形光辉灿烂”<sup>③</sup>。女词人顾太清(1799—1877)“深稳沈著,不琢不率”,有满族词人“男中成容若,女中顾太清”之誉。“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的龚自

钱仲联:《近代诗坛鸟瞰》,《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第276页。

见叶恭綽:《全清词钞 序》中引语,《全清词钞》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叶恭綽:《全清词钞 序》,《全清词钞》上册,第2页。

珍；词隼丽飞扬 意欲合周、辛而一之 奇作也。（谭献《复堂日记》）词似白石”的姚燮，词作隼永俊美，不同凡响。被誉为清代三大词人之一的蒋春霖（1818—1868）谭献称为“词人之词”的代表；婉约深至 时造虚浑，要为第一流矣”（谭献《复堂日记》）。同治之后，人称“词的中兴光大的时代”，一时名家辈出，高手如林。王鹏运（1849—1904）、郑文焯（1856—1918）、朱孝臧（1857—1931）、况周颐（1859—1926）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曾提出过“重、拙、大”之说 陈廷焯（1853—1892）提出过沉郁说，都是力图在词的创作上有所突破和开拓。此外，影响较大的尚有谭献（1832—1901）、庄棫（1830—1878）、文廷式（1856—1904）、王国维（1877—1927）、吴梅（1884—1939），怀念国运，哀感极深，抒发寄托，言近而旨远，均有相当成就，故近代词不仅是清代词中兴的发展和继续，而且在中国词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称为中国古典词的“一大后劲”或“一大结穴”<sup>②</sup>。

近代散文也很有成就。龚自珍、魏源都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他们以批判封建末世为其特色的经世之文，在当时影响很大，康有为称龚自珍的散文为清朝“特立独出者”<sup>③</sup>。与龚、魏散文革新精神相呼应，包世臣（1775—1855）、蒋湘南（1795—1860）、冯桂芬（1809—1874）在散文领域要求冲破桐城“义法”的束缚；称心而言 不必有义法（冯桂芬：《复庄卫生书》）。稍后的王韬（1828—1897），在散文领域中更力主革新，他的《漫游随录》、《扶桑游记》就是两部富有文学色彩、充满新鲜气息的纪游散文集。康有为的散文，大笔淋漓，汪洋恣肆，感情充沛，力破樊篱，《强学会序》、《上清帝第五书》是其代表作，他的弟子梁启超所创“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新文体”，就是康氏散文的发扬光大。梁启超的文章颇受青年欢迎，《变法通议》、《新民说》、《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他的散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

后来他的同乡况周颐又在《蕙风词话》中阐发此说。

② 叶恭绰：《全清词钞 后记》，《全清词钞》下册 第 2068 页。

《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全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499 页。

导。<sup>①</sup> 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邹容（1885—1905）、秋瑾、章太炎（1869—1936）、章士钊（1881—1973）的政论文，批判封建专制，赞美民主革命，也都有很强的感染力量。说理透辟，逻辑性强；富有思辨色彩，是其共同的艺术特色。此外，近代白话文热潮的兴起，大批《白话》报刊和白话书籍的出现，对于促进近代散文的变革和“言文一致”也有积极的影响。在近代散文发展中，桐城派散文的成就也不可忽视。梅曾亮（1786—1856）就提出过“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的主张，顺应时代的需求，桐城派作家写了一些具有反侵略爱国精神和充满时代内容的散文，一时有“桐城中兴”之誉。在这一派作家中，薛福成（1838—1894）、黎庶昌（1837—1897）、郭嵩焘（1818—1891）、吴汝纶（1840—1903），或做过外交使节，或曾出国考察，视野开阔了，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写了不少描写海外风光和歌颂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散文，清新流畅，意境新颖，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散文的近代化，其积极意义也不可低估。总之，近代散文取材广阔，内容丰富，形式日趋解放，朝着自由化、通俗化和“言文合一”的走向迈进。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近代散文是由文言古文向现代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它的“中介”作用和艺术成就都是不可忽视的。

近代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背景广阔，题材丰富，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近代小说品种多样，流派纷呈，在叙事模式、艺术形式（如长篇小说章回体的突破、短篇小说的繁荣）和描写手法上（如注意人物外形描写、心理描写，以及自然景色、生活环境描写），受西洋文学的影响，也有不少新的开拓。被鲁迅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以及近代的其他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九命奇冤》、《禽海石》、《断鸿零雁记》<sup>②</sup> 等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仅《老残游记》一种，就有译成日、英、法、俄、德、捷克、匈牙利、韩等八种文字的 19 种版本在国外发行；倘连同中文版本，80 年来，一部《老残游记》就有九种文字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见《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 1934 年版，第 167 页。

《断鸿零雁记》有日、英、德、法、俄等五种版本，见柳无忌著、冬云译：《磨剑鸣篴集 前言》刊《南学通讯》第 17 期（2000 年 6 月出版·北京），第 179 页。

的 130 余种版本行销世界（此统计仍有遗漏）<sup>①</sup>。蒙古族小说家尹湛纳希（1837—1892）的小说《一层楼》也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sup>②</sup>。另一方面，研究中国近代小说的外国学者也很多，著名的专家有捷克的杰罗斯拉夫·普实克、苏联的谢曼诺夫、加拿大的 M.D. 维林吉诺娃、匈牙利的粤德里奇·卡拉尔、美国的培瑞·林克、法国的琼·杜瓦尔，以及日本的松井秀吉、宫田一郎、泽田瑞穗、中村忠行、樽本照雄、麦生登美江、中岛利郎、韩国的吴淳邦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小说不仅已走向世界，且有了很大反响。

近代戏剧也是很繁荣的。虽然传奇、杂剧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古老形式已面临尾声，但近代戏剧家也在探索革新的道路，他们期望这种传统的旧形式经过若干革新能为近代的救亡图存和民主革命服务。范元亨（1819—1855）的《空山梦》、李文瀚（1805—1856）的《银汉槎》、徐鄂（1850—1910）的《梨花雪》、叶楚伦（1887—1946）的《落花梦》、蒋景域的《侠女魂》、吴梅的《轩亭血》，正是这种文学思想在创作上的反映。近代戏剧，经过改革和“戏剧改良”运动，描写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故事，以及宣传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的作品大批出现，外国革命志士、虚无党、女豪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占据了近代舞台。郑振铎先生评近代戏剧说：“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sup>③</sup>评价是很高的。

在近代戏剧中还值得珍视的是地方戏，也称为“花部”或“乱弹”，其中许多剧目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京剧《打渔杀家》、《玉堂春》、《四进士》、《连升店》、河北梆子《秦香莲》、豫剧《穆柯寨》、《花木兰》、闽剧《炼印》、川剧《情探》、粤剧《搜书院》、楚剧《葛麻》、柳子戏《徐龙打朝》……许多剧目至今仍活在舞台上。地方戏是近代戏剧的丰富宝藏，十分值得

关于《老残游记》的版本材料，其外文部分来源有四：其一据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编：《刘铁云研究资料目录》（载日本《清末小说研究》第 1 号）；其二据刘德隆等著：《刘鹗小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3 至 184 页；其三据匈牙利学者陈国先生提供的《匈牙利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1945—1987）；其四据韩国安熙珍的《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又，节译本未统计在 19 种外文版本内，仅日本就有六种。中文部分 111 种，据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书目，又补充统计《民国六十三年（1974）中华民国图书总目录》（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74 年出版）和《民国六十四年中华民国图书总目录》（台湾洪氏出版社 1975 年出版）中所收《老残游记》书目而为《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未载者。

② 苏联《东方文学作品选》第 11 辑，苏联艺术出版社 1983 年翻译出版。

③ 郑振铎《晚清戏曲录序》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目》，1955 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第 3 页。

重视。

在近代文学中，弹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明清以来，弹词兴起，降至近代，长篇更多。它们的作者大多是女作家，比较著名的有邱心如（1805—1873）的《笔生花》、郑贞华（1811—1860）的《梦影缘》、程蕙英的《凤双飞》和周颖芳的《精忠传》。这些弹词多情节曲折，波澜起伏，人物塑造细腻生动，语言通俗流畅，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此外还有李伯元（1867—1906）的《庚子国变弹词》和无名氏的《法国女英雄弹词》、《女界文明灯》，其主题是反映庚子事变和宣传妇女解放的，后两篇弹词在形式上力图突破弹词窠臼，以适应表现新时代内容的需要。弹词虽近于长篇叙事诗，但因为它是讲唱文学，当属于近代俗文学的范围。

近代翻译文学的繁荣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瑰丽景象。以翻译小说为例，近代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以及相当一部分文学刊物<sup>②</sup>均刊登翻译文学（主要是小说），许多书局也出版翻译小说，一时如雨后春笋。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近代翻译小说 2 545 种，近代翻译文学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世界上数十位著名作家的著名作品。如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的《天方夜谭》、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美国史托活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以及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英国的拜伦、雪莱、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等一流作家的作品。仅林纾（1852—1924）一人就翻译了十多个国家 180 余种文学作品，计 1 200 多万字。此外如吴棫（？—1912 前后）、奚若、曾杕（1872—1935）、伍光建（1867—1943）、周桂笙（1873—1936）、徐念慈（1874—1908）、包天笑（1876—1973）苏曼殊、马君武、周瘦鹃等人，在文学翻译上也都有很大贡献。这些翻译作品，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彼此的了解，而且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纠正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学自我优越感的传统偏见，为近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对于“五四”之后的现代文学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见陈寅恪《论再生缘》，《中华文史论丛》第 7 辑。

如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包天笑、陈景韩编的《小说时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林紫虬主编的《新小说丛》黄山民编的《小说海》包天笑编的《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

近代的文学理论，尤不可等闲视之。第一，这时期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史论等专著、专书近百种，其单篇论文要以千篇计。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范围已由过去单纯的诗、词、文进而扩展到全部文学体裁（如小说、戏曲、话剧、翻译文学）的评论，特别是在小说和戏剧理论方面，已由古代片言只语的评点或即兴式的发挥发展为长篇专题论文。如严复（1854—1921）和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钟麒（1880—1914）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狄葆贤（1873—1921）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黄人的《小说林·发刊词》、徐念慈的《余之小说观》、金松岑（1874—1947）的《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管达如（1892—1975）的《说小说》、成之吕思勉（1884—1957）的《小说丛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柳亚子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辞》、陈去病的《论戏剧之有益》、蒋观云的《中国之演剧界》、三爱陈独秀的《论戏曲》、天僊生（王钟麒）的《剧场之教育》，这种情况在古代文论中是罕见的。第二，近代文学理论所探讨的内容也比以前更加系统和深入，不少文艺问题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新的建树，特别是刘熙载（1813—1881）、陈廷焯、梁启超、章太炎、吴梅、王国维等人，已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自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第三，近代文学理论还吸取了外国哲学和美学的营养，像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已经运用近、现代的文化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来研究文学问题了。他们的论著不仅有了比较、鉴别，而且也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比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用近代西方哲学的、美学的观点评论文学作品的论著。它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即兴发挥的评点派和牵强附会的索隐派的研究方法，而是以严密的形式逻辑和思辨、推理、比较的思维方法对《红楼梦》与人生、《红楼梦》之精神、《红楼梦》的伦理观、《红楼梦》的悲剧性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因此，像王国维这样的论著，不论是研究方法、思维方式，还是理论色彩，都是古代文论中所不具备的。此外，林纾的一些译著序跋，如《孝女耐儿传·序》、《块肉余生述·序》、《斐洲烟水愁城录·序》等，把狄更斯、哈葛德的小说和我国的《红楼梦》、《水浒传》、《史记》相比，也属于“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具有比较文学中“平行比较”的性质，这是近代文论中新的光彩。它打开了中西文化对话的窗口，标志着中国文论已立于世界文学批评之林。

## 二

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有突破性的发展，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值得我们珍视。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它的发展史，是一部我国各族人民共同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文学丰富的宝藏，是我国各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古代文学中，少数民族虽也产生过像《格萨尔王传》（藏族）、《江格尔》（蒙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这样的已列入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的巨著，以及《尼山萨满》（满族）、《尸语故事》（藏族）、《乌古斯传》（维族）、《阿诗玛》（彝族）、《望夫云》（白族）、《召树屯》（傣族）等名著，但这类作品多系民间集体创作，带有神话和传说的性质；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脱离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步入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调的文人文学则开始于近代。在文学体裁方面，它从以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歌谣为主体，发展为以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为格局的文学形式构架，在表达形式上也多由口头说唱文学转向书面叙事文学。自然这与社会的进步、民族文化（包括文字）的发展、印刷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知识分子创作群体的壮大等等因素有关。因此在近代，少数民族文学较之古代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和很大的发展。

中国近代少数民族文学，由于学术界研究较少，不论数量还是质量，至今我们还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但据我初步摸底，中国近代少数民族文学家当不少于 200 人，即仅就本书所论及的满、蒙、壮、白、回、维吾尔、布依、土家、彝、藏、哈萨克、侗族等 12 个少数民族的近代文学家来统计，也有作家百余人。

满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兄弟民族。由于在清代它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长期与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它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因而在文学上很有光彩。清代杰出的词人纳兰性德即是满族人。降至近代，满族中出现了不少知名的文学家。女词人顾太

盛昱编《八旗文经》，收八旗作家 197 人，作品 650 种，倘以十分之一计，属于近代的满族作家约 20 人。壮族近代作家，据有的学者估计约 60 人，较有成就的 20 人左右（曾庆全：《近代壮族文人概况》）。查欧阳若修等编著的《壮族文学史》，收近代作家 22 人。蒙古族近代作家约 20 人（据著者所查蒙古族文献）。张文勋主编：《白族文学史》收近代作家 17 人。彭继宽主编的《土家族文学史》收近代作家 10 余人。回族、维吾尔族的近代作家当不少于白族。

清、诗人爱新觉罗宝廷(1840—1890)、宗 韶(1844—1899)、小说家文康、戏剧家汪笑侬(1858—1918),都是驰名近代文坛的人物。此外,还有裕瑚鲁承龄(1814—1865)、庆康(1834—?)、盛昱(1850—1899)、志锐等文学家。爱新觉罗宝廷,是近代满族著名诗人,他喜游山,集中多纪游之作。他的《田盘歌》、《七乐》、《西山纪游行》均系抒情诗中的长篇 后者长达 2 921 字,在中国古典诗歌长篇中亦属罕见。他一生坎坷,曾因娶江山船女为妾而自劾落职。宝廷为人正直,敢言事,系清末著名的“四谏”之一。罢官后仍以诗酒为友 诗作可观 著有《偶斋诗草》和《偶斋词》 他是近代满族最著名的诗人。

裕瑚鲁承龄,是近代满族词人中较突出的一位,他著有《冰蚕词》,为人传诵 谭献赞为“草窗胜境”、“幽靓凄婉”(《篋中词》)。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是近代小说中的名著,作品中的主人公十三妹几乎家喻户晓,至于小说语言的生动与风趣,那是有口皆碑的。汪笑侬,是满族一位著名的戏剧改革家和表演艺术家。他编有结合现实的新皮黄剧本《党人碑》、《博浪椎》、《哭祖庙》、《受禅台》等 24 种 有《汪笑侬戏曲集》行世。

蒙古族文学在近代大放异彩。杰出的小说家尹湛纳希以他的历史小说《青史演义》和爱情小说《一层楼》、《泣红亭》轰动文坛 开创了蒙古族近代小说创作的新纪元。他的长兄古拉兰萨(1820—1851)是杰出的爱国诗人。古拉兰萨精通汉文,熟悉汉族历史文化。他的诗在蒙古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和吸取了汉族格律诗的形式和艺术,开创了蒙文诗歌的民族新形式,既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又有汉族古典诗歌的韵味,诗人融合蒙汉文化所形成的蒙文诗歌,对于促进蒙古族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女诗人那逊兰保(1801—1873),“蕙性夙成,苞华绝出”<sup>②</sup> 时人称为“喀尔喀部落女史”,著有《芸香馆遗诗》。著名学者兼诗人的李慈铭评其诗云:兰保诗“清而弥韵,丽而不佻。高格出于自然,深情托以遥旨。怀人送远之什 登山临水之吟 踵轨风骚 熔情陶谢 洵足抗美遥代 传示后来。”此外还有讽刺诗人伊希·丹金枉吉拉(1854—1907)、诗人贺什格巴图(1849—1915)、延 清(1846—?)、嘎莫拉(1871—1932)、三多 以及翻译家、理论家哈斯宝。哈斯宝把《红楼梦》这部名著介绍给蒙古人民,并写了《新

参见赵永铨《“古尹诗派”格律诗之形成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二,1914 年刊本。

盛昱:《芸香阁遗诗 跋》,民国十七年(1928)武进涉园石印本。

译红楼梦》四十回回批，在《红楼梦》批评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在近代少数民族文学中，蒙古族和满族的成就最为突出。

近代壮族文学的成就，仅次于满族和蒙古族。明清以来，壮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制度，随着流官进入壮族地方政治，汉族文化也大量传入，开设书院，倡导科举，大批壮族文人的产生，是近代壮族文学繁盛的主要原因。壮族作家郑献甫（1801—1872）是壮族文学史上的一颗巨星，他著作甚丰，有经学、文学、考据方面的著作十余种，以诗的成就最高。著有《补学轩诗集》八卷、《续刊补学轩诗集》十二卷。郑氏现存诗2800余首，他的《火轮船歌》、《辛酉六月二十六日于花舫观番人以镜取影歌》均是近代初期描写西方新事物、新意境的佳作，后者写于1861年比黄遵宪‘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名篇《今别离》（1890）要早近30年。另一位著名诗人韦丰华（1821—1905）著有《今世山房吟草》存诗数百首又有《今是山房吟余琐记》五卷。他的诗作《谈时艰有感八首》、《解馆将归时事交感夜坐示诸及门十四首》、《杂感四首》揭露壮族统治者的残暴反映粤西农村的景况，颇有特色。黄焕中（1832—1912前后）是一位爱国诗人，著有《天涯亭吟草》诗人曾鸿燊（1865—1931）著有《瓶山诗集》三卷、《瓶山文集》一卷他的诗文集今已难见）今《同正县志》中存曾氏诗100余篇。其中反映甲午战争前后的诗篇有30余首其《游香港》、《电线行》、《火车行》、《烟台舟次》诸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壮族诗歌中的佳作。

回族中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是蒋湘南，他还是一位学者，其《春晖阁诗选》和《七经楼文钞》都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另外如马之龙（1781—1851），回族诗人有《雪楼诗选》二卷存诗200余首，以咏雪赞梅隐喻自己高洁的品格，以山水、酒、笛来寄托自己的怀才不遇和苦无知音。

维吾尔族近代文学进入了以直面人生、针砭时弊为特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阶段。尼扎里（1776—1848），本名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笔名尼扎里，是维族最负盛名的诗人。他是维族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家，其长达33000行的《爱情长诗集》<sup>①</sup>是维族文学史上的一串明珠，连同他的哲理性诗作《济世宝珠》和抒情诗集《穆罕默德诗集》，把维吾尔族叙事长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特别是爱情长篇叙事诗《热碧亚与赛丁》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热碧亚与赛丁这一爱情悲剧，揭露了造成这一悲剧

<sup>①</sup> 《爱情长诗集》包括《法尔哈德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依》、《麦赫宗与古丽尼莎》、《热碧亚与赛丁》等十二部叙事诗。

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传统观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夏尔仓(1781—1851)，是这时期的藏族民间文学家，他对整理藏族民间文学有很大功绩。他的文学创作《奇幻集》是一部神话、故事、寓言集，渗透着民间文学的营养。米旁嘉错(1846—1912)或称米旁朗杰嘉错，是藏族著名学者和诗人，他的《国王修身论》和《诗疏妙音海》是藏族近代文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诗集。前者系格言哲理诗，凡6000余行，对藏族诗歌突破固定程式走向自由化有积极影响。还值得一提的是藏族俗人文学家西嘎林巴·明久伦珠(1875—1914)他著有《西嘎林巴家世传》和《拉萨思念曲》。

白族作家以赵藩(1851—1927)最著名，他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据《滇八家诗选》称他有诗70余卷，万余首，现仅存《向湖村舍诗文集》、《骈文诗钞》、《鹤巢謄小录》等，但在白族诗人中仍居首位。朱筱园称其诗“气体高华，骨韵生峭，笔力苍劲，法度谨严。”<sup>①</sup>赵式铭(1872—1942)他是白族南社诗人。辛亥革命前还曾创办《丽江白话报》和《永昌白话报》，著有《睫巢诗稿》和《补遗》、《希夷微室诗钞》、《睫巢文稿》等，诗文中充满着反帝爱国激情。他还是一位戏剧家，他写的滇剧《苦越南》(1906)借越南亡国痛史激发国人的爱国热忱，是滇剧描写时事最早的尝试。

彝族诗人余若琮(1870—1934)著有《惺雅堂诗集》十四卷，爱国深情，溢于词间，其《南征》长歌，对殖民主义侵略罪行有颇多揭露。他如《秋感》八首，“沉郁劲健”、“悲凉激越”均系名篇。

侗族的戏剧家吴文彩(1798—1845)，贵州黎平人，是侗戏的创始人，他编写和整理的剧目如《李旦凤姣》、《梅良玉》、《毛宏与玉英》，至今仍在贵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和广西的三江等侗族自治县流传。

土家族文学家彭勇行(1835—1892)字果亭，同治贡生，湖南永顺县人。诗文“悲壮沉雄”，有《笃庆堂古文辞》、《古近体诗》二卷、《骈体文》卷等，可惜多未传世，今存者仅有七律五首、七绝八首、五古一首、七古二首、竹枝词41首<sup>②</sup>。此外还有川东诗人陈汝璣、陈景星，前者有诗集《答猿诗草》存诗900首，后者亦有诗近700首，内容丰富，颇多可诵之作。尤值得一提的是土家族两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诗人温朝钟(1877—1910)和席正铭(1885—1920)，贵州人。他们都是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献

王灿辑：《滇八家诗选》，民国三十一年(1942)云南印刷局排印本

见彭继宽、姚继彭主编《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页

身的烈士，同时又都在戎马倥偬之余写诗吟唱，分别有诗集《掷地金声》（抄本）和《冷冷山人集》行世。其作品气魄宏伟，感情炽热，“提起寰球烘白日 掀翻苍海洗青天（温朝钟：《酬王克明》）；欲博自由宁惜死 战争那怕鼓鼙歌。”（席正铭：《次韵王思芩知事留别甲寅夏避难秀州》）两位革命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诗人描写家乡、寄情亲朋的诗篇，像温朝钟的《题小南海》、《吟牛背岛》、席正铭的《甲寅避难秀山》、《东游车中作寄内子》，又感受细腻，情思缠绵，一往深情，备感亲切。在近代少数民族作家中，这两位年轻的土家族爱国诗人是值得珍视的。

诗人莫友芝是布依族作家，他是近代著名的宋诗派诗人，与同乡、著名诗人郑珍齐名，时人并称“郑莫”，二人同为近代贵州最有成就的诗人。他著作颇丰，有关于经史、音韵、文字、书画、目录、地方志和文学著作十余种。他学识精博，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的吴嵩梁曾把他作为全国 14 名“学问之士”之一，推荐给皇帝。他的诗虽有“以学为诗”的倾向，用典太多，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清新流畅，诗意盎然。有《邵亭诗钞》和《邵亭遗诗》行世。他的弟弟莫庭芝，是一位词人，著有《青田山庐词》。

阿合特·乌娄木吉（1867—1940），是近代哈萨克族最著名的诗人，他天资聪慧，精通阿拉伯语。著有叙事长诗《吉夏汗》（1891）、《哈布德力一马里克》（1902）、《地狱景况》（1908）、《赛甫尔克里克与加卫力》（1909）。十月革命后，他还写了近百首富有理性的现实主义诗篇，对推动哈萨克族文学创作的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还有努斯甫别克霍加·夏依克斯拉木（1857—1937）、库岱克·玛拉力拜（1888—1939）等诗人兼歌手，在哈萨克族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国近代少数民族文学，由于各民族历史状况和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各民族间，文学的思想成就和审美价值无疑是存在差别的；但各兄弟民族作家均以自己的审美创造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其主要层面而论，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近代少数民族作家虽然大多地处边陲，并受到诸多政治和文化条件的限制；但他们多数都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历史风云的变幻，他们的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大主题。

蒙族杰出的爱国诗人古拉兰萨，在鸦片战争初期就写了著名的诗篇《祝灭寇班师还》和《太平颂》，热情地赞颂了中国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正义斗争，表现了蒙古族人民和祖国各兄弟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英

雄气概。壮族诗人黄焕中（1832—1912?），目击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剧，投笔从戎，参加了刘永福的黑旗军，参赞军务，从广东到越南，从闽南到台湾，奔驰于抗法前线 and 抗日疆场。在戎马倥偬中，他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爱国诗篇，《秋兴八首用杜工部原韵》组诗、《远望九龙》诸作表现了诗人昂扬的反侵略的爱国精神。土家族青年诗人温朝钟和席正铭，他们热情地讴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感情炽热，气势宏伟，英雄形象跃然纸上。这类诗作都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

近代少数民族文学家在反映近代重大的社会主题时，又具有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和独特的审美选择。同是反映近代天地会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文学作品，壮族诗人郑献甫笔下的“拉生”（《劫盗行》）“避难”的描写（《村人共避岩居藏身》）就具有粤西山区的特色。同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小说，尹湛纳希的《一层楼》和《泣红亭》虽然这两部姊妹篇是摹仿《红楼梦》的，但和一般中国古典爱情小说不同。这是因为作者是从清中叶漠南蒙古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社会生活出发进行艺术构思和审美选择的，因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思想蕴涵就和汉族青年男女有所不同。它根基于清代漠南蒙古族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并带有作家自己的审美个性。如琴默对爱情的大胆追求，炉梅的笃于爱情、待人宽厚，画眉的机智、粗犷的性格，蔑视主奴尊卑、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了19世纪中叶漠南蒙古青年个性觉醒初期的时代因素，而且鲜明地带有蒙族姑娘的文化气质和性格特点。

（二）近代少数民族文学描写了各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环境和风俗民情，为中国近代文学增添了生机和光辉。

近代少数民族作家在选择题材时总是把审美重心放在自己最熟悉、最喜爱的本民族的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他们用自己的彩笔描绘了一轴轴本民族绚丽的生活画卷，塑造了许多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民族个性的人物形象，给中国近代文学增添了光彩。尹湛纳希《青史演义》中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名将木合黎和孛罗忽勒、军师毛浩来、美丽多情的索隆高娃、花木兰式的女英雄洪古尔珠兰，维吾尔族诗人尼扎里的叙事长诗《热碧亚和赛丁》中的男女主人公，这些艺术形象都渗透着本民族的心理和审美理想。《儿女英雄传》中关于满族生活的描写很有民族特色。小说第二十八回写十三妹嫁安骥办婚事的过程，从新娘的穿戴、迎娶、拜堂到入洞房，十分细致入微而又真实、形象地描写了满洲贵族婚礼仪式的全部内容。你看那新郎到女家迎娶时的“升堂奠雁”，新郎在家门口迎亲

时的“连放三箭”，拜堂后的“新人新贵行绾结同心礼”，又女抱鎏金宝瓶、男执青铜圆镜，以及洞房中梳妆台旁边倚着的那杆新秤（取“称心如意”）等等，这一切无不显示着满洲贵族婚礼的仪式特色。再如小说《一层楼》第二十九回写璞玉与苏己结亲时，男方送的彩礼是：

银钩白驼为首，驼骆一九；全鞍轡马为首，马匹二九；锦羊为首，汤羊三九；奶酒为首，酒类四九。

这种结婚彩礼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仪礼特色。我们在描写汉族婚礼的文学作品中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彩礼清单。历史小说《青史演义》中的许多画面更具有蒙古族的民族特色。此外，在藏族作家夏尔仓、侗族戏剧家吴文彩、哈萨克族诗人哈合特·乌娄木吉的作品中都有许多精彩的具有不同审美情趣和浓郁民族特色的自然风光、生活场面和细节描写。这就为我们考察中华民族的心灵流程以及文化心理、审美情趣提供了更加丰富、生动、形象的资料。

### （三）促进了祖国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在近代中国文学中，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各民族的书面文学、文人创作，在近代进入了一个繁盛期。在民族文化交流中，汉族文化对兄弟民族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但也应当承认，民族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民族文学双向影响和互补的现象。

在近代文学中，满族、蒙古族、壮族、回族、布依族等民族的作家都有受汉族文学影响的鲜明例证和痕迹可寻。像壮族作家郑献甫、布依族诗人莫友芝、回族文学家蒋湘南、满族女词人顾太清，他们的作品几乎完全汉化了，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着汉族文化的因子，以致莫友芝和蒋湘南长期被误认为是汉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小说《一层楼》和《泣红亭》不仅有摹仿《红楼梦》的痕迹，而且作者在创作这两部小说时还借鉴和吸取了《镜花缘》、《金瓶梅》、《三言》、《二拍》、《西厢记》等古典小说戏曲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人诗歌中的片断、场面和句子。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在少数民族作家中举出很多。

近代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近代少数民族的民歌对邻近地区的汉族文人诗歌创作、满族子弟书对于近代长篇叙事

诗的语言都有积极的影响<sup>①</sup>。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儿女英雄传》为了历史地、真实地再现满族人的生活，在汉语中杂用满语的地方有七八十处<sup>②</sup>。这些满语有的是称谓和一般词语，也有的是一个长句子。《儿女英雄传》中最长的满语句子竟达 41 字（第四十一回）。这种情况不仅加重了小说的民族色彩，而且也反映了清中叶那个特定的时代满汉文化的交流情况，以及满语对汉族文化的影响。清人奕赓在《佳梦轩丛著·括谈》中记载曰：“日常社交，常谈之语，有满汉兼用者，谈者不觉，听者不知，亦时习也。”这些“谈者不觉，听者不知”的词语，也就是老舍在小说《正红旗下》中所说的：是“旗人惯用的汉人也懂得的满文词儿”<sup>③</sup>。《儿女英雄传》中的这种现象，正表明了满族语言对汉语和汉族文化的影响。

蒙古诗人三多，系樊增祥弟子，他善用汉族古典格律诗体写诗，著有《可园诗钞》。他写诗“富于隶事，逼肖其师”。又熟悉满蒙各地方言，常用蒙古语入诗。如《归绥得冬雪次尖叉韵》诗中云：“沙亥无尘即珠履，板申不夜况华檐。”“沙亥”蒙语鞋名；“板申”蒙语房屋。再如他的《边庭三叠前韵》诗云：“蔬餐塞上回回白，楼比江南寺寺红。”“回回”蒙语白菜名。由于他精于蒙语，又巧于对仗，不仅传播了蒙族文化，而且诗也富有韵味。

少数民族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加强了民族间感情和文化的交流。这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和双向互补，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学的发展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以上是中国近代少数民族文人创作的大体情况。

在近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数量更多的是民间口头文学，如民歌、民间故事、民间叙事诗、英雄史诗、民间说唱等，它们以其丰富的主题、动人的情节、刚健清新的语言和独特的民族风格，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这都有待于中国近代民间文学史之类的专著加以论述。

见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姚燮》，《梦茗庵清代文学论集》，齐鲁书社 1983 年版，第 136 页。

② 见赵志忠、季永海《儿女英雄传的满语语汇特色》，《民族文学研究》1985 年第 3 期

③ 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21 页